

Hébert, R. F. (1985). Was Richard Cantillon an Austrian Economist?.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7(2), 269-279.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理查德·坎蒂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吗？

罗伯特·F. 赫伯特（Robert F. Hébert）

引言

会有人认真对待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吗？历史清楚地揭示了以下事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 1871 年维也纳经济学家卡尔·门格爾的开创性工作。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写于近 150 年前。直到 1881 年 W.S. 杰文斯（W.S. Jevons）将其重新介绍给经济学家们之前，它实际上一直未被发现。坎蒂隆和门格爾之间绝对没有时间上的联系，任何知识上的联系都是推测性的。

无论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相当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可以证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分析传统——始于上个世纪的门格爾，并由冯·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等人维系——与理查德·坎蒂隆的经济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经济思想史学家们通常不承认这一事实，甚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也不总是承认这一事实。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经常声称，他们的分析传统更多地与 18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共享，而不是更多地与随后从其发展而来的新古典主义分支共享。对于习惯于将门格爾视为新古典主义**创始人**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一说法无疑是一个混乱的根源。这种混乱可以追溯回在经济分析史中将杰文斯、门格爾和瓦尔拉斯视为智识替代品的普遍倾向。¹ 同样的情况是，很少有人尝试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原则建立在前门格爾时期的著作中。本文通过识别和检验理查德·坎蒂隆与当今奥地利学派传统的捍卫者之间的某些亲缘关系，在最后一个方面做出了初步的修正。

坎蒂隆的《概论》代表了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水平。这是一篇具有敏锐洞察力和非凡清晰度的综论，这些特征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黯淡。它包含成本和生产理论、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货币和信用理论。与较晚时代更狭窄的论文不同，《概论》不采用从对外贸易中抽象出来的封闭经济模型，也不将人口视为外生变量。然而，由于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坎蒂隆分析的某些主题随后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中消失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个这样的主题最终成为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大厦的基石。² 使坎蒂隆的经济学与

¹ 关于打破这种思维习惯的最近一次值得注意的尝试，请参见 William Jaffé,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Economic Inquiry* (December, 1976). pp. 511–24.

² 坎蒂隆的《概论》在 18 和 19 世纪的一种流通方式，是作为由 Eléazar Mauvillon 在 1754 年至 1757 年间编辑的《政治论述》（*Discours politiques*）的一部分。《论述》是一部五卷本的作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密切联系的这三个主题是（1）坎蒂隆对市场体系及其运作的看法，（2）企业家在坎蒂隆分析中的核心和关键作用，以及（3）货币变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

市场体系

坎蒂隆将经济设想为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市场组成的有组织的系统，其运作以实现某种均衡。这个有组织的系统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以响应“需要和必要性”³，这反过来又将社会的所有居民结合成“互惠网络”。⁴系统由自身利益的自由发挥来保持调整；经济的动力由从事“国家的一切交换和流通”的企业家阶级提供。⁵考虑到坎蒂隆写作的时代，君主被赋予了非常低调的形象，这一事实背叛了坎蒂隆的信念，即市场体系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运作最佳。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样，企业家也受到互惠的约束，因为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消费者和客户。”⁶因此，他们的数量受客户数量或对他们服务的总需求的影响，他们的决定是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

这个经济体系的结构是分级的。地主居于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顶端，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尽管他们从一个国家的居民那里获得收入，而这些居民反过来又依赖所有者提供生产中的自然资源。私有财产权被认为对市场体系的成功运作至关重要。⁷企业家在坎蒂隆的等级制度中处于中层，但是——正如下一节所解释的——他们的角色至关重要且无处不在。正是他们不断对特定市场的价格变动做出反应，以便在特定供应和特定需求之间取得初步平衡。

坎蒂隆将经济视为相互交换的网络，对市场价格提供了最清晰的早期解释之一。然而，他的**内在**价值概念（衡量进入生产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数量与两种投入质量的关系）很可能是经济分析史上的一条红鲱鱼⁸。在坎蒂隆看来，市场价格取决于“实际成本”以外的因素，其中一些是主观因素，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于是他写道，

品，再现了从大卫·休谟的同名作品开始的当时的重要著作。第3卷包含坎蒂隆的《概论》的再版。有趣的是，门格尔的图书馆只包含第1卷、第4卷和第5卷，而不是第3卷。因此，坎蒂隆似乎对门格尔没有直接影响。关于这一点，参见 Takumi Tsuda, “Etude Bibliographique sur L’Essai de Cantillon,” in Richard Cantillon, *Essay de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 (Tokyo: Kinokuniya Book-Store Co., 1979), pp. 416 ff.

³ Richard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ed. and trans. by Henry Higg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1), p. 46. 在整篇论文中，我使用了我自己对本版重印的法语原文的翻译。

⁴ J. J. Spengler, “Richard Cantillon: First of the Moderns,” in Spengler and Allen, *Essays in Economic Thought: Aristotle to Marshall*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1960), p. 109.

⁵ Cantillon, *Essai*, p. 56.

⁶ 同上，p. 52.

⁷ 同上，p. 6.

⁸ 转移注意力的东西。——译者注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许多实际上具有这种内在价值的物品在市场上并没有以这种价值出售：这将取决于人们的兴致和喜好以及他们的消费情况。⁹

市场价格可能与内在价值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产者及其客户的计划可能不协调。事实上，要实现**完全**的协调似乎是不可能的。坎蒂隆观察到

内在价值永远不会变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商品和产品的生产不可能一直与其消费成比例，这导致市场价格的每日变化和无休止的波动。¹⁰

奥地利学派对竞争价格决定的看法强调买卖双方的主观评价以及参与交换的人所拥有的信息。个人对市场数据变化的调整**过程**提供了这种观点的关注焦点，而不是均衡的最终状态。例如，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存在一种均衡趋势的断言“几乎意味着……人们的期望，特别是企业家的期望将变得越来越正确。”¹¹ 哈耶克将价格机制视为分散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传输设备。在某些假设下，这种信息传输改进了市场交易者计划的协调。然而，协调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因为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信息永远不会完全。哈耶克总结说，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许多人的自发互动——每个人都只拥有一点点知识——如何导致一种价格与成本相对应的事态……”¹²

我注意到了这里的陷阱，即在坎蒂隆与哈耶克的发现之间强行追求一致，但除了后者的重要认识论贡献外，在我看来，两位作者的目标相似。坎蒂隆所描述的讨价还价过程反映了市场参与者所掌握的信息和个人计划的协调程度。坎蒂隆甚至描述了不同的计划如何使价格远离成本（即内在价值）。

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民播种的小麦比平时多，也就是说，比每年消费所需的多得多，小麦的实际价值和内在价值将与投入生产的土地和劳动力相对应；但由于供过于求，小麦的卖者多于买者，小麦的市场价格必然会低于成本或内在价值。相反，如果农民播种的小麦少于消费所需，那么买家将多于卖家，市场价格将高于其内在价值。¹³

只需用“自然”一词代替“内在”，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分析与亚当·斯密的分析有多接近，并且，如果坎蒂隆没有走得更远，他也因此将提供对价格机制的重要描述。但他确实走得更远，这是他的功劳，因为他对用于连接不同市场的价格信号网络提供了基本解释。下面这段话提供了众多的建议，即将自身利益作为动力，将相对价格作为调整资源使用的信号，将机会成本作为经济决策的基础。

⁹ 同上，p. 28.

¹⁰ 同上，p. 30.

¹¹ F.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45.

¹² 同上，p. 51.

¹³ Cantillon, *Essai*, pp. 28–30.

因为如果一些农民在他们的土地上播种比平时更多的谷物，他们将不得不放牧更少的羊，因此可以出售的羊毛和羊肉就会减少。因此，居民消费的粮食过多，羊毛过少。因此，羊毛会很贵，这将迫使居民把衣服穿得比以往更久一些；并且，谷物将会过多，来年会有剩余……农民……明年将注意减少谷物和增加羊毛，因为农民总是寻求使用他们的土地来生产他们认为会带来最高市场价格的东西。但是，如果第二年他们的羊毛过多而谷物过少，他们就会逐年改变土地的用途，直到他们或多或少地调整生产以适应居民的消费。因此，一个农民将把他的农场的一部分用于种草——为了干草，另一部分用于谷物，另一部分用于羊毛，等等，除非他看到需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否则他不会改变计划。¹⁴

读完这段话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它展示了买卖双方之间最初不兼容的计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对相对价格变化的自利调整而变得相互兼容，牵强吗？如果不牵强，那么坎蒂隆的论点与奥地利学派关于价格机制的性质和行为的观点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现代的、新瓦尔拉斯主义的竞争理论受到了哈耶克和柯兹纳的严厉批评。¹⁵ 新瓦尔拉斯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精确和严格地描述均衡的数量本质，它忽略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市场行动过程。前一种分析传统一直专注于从一组同样独特的市场环境得出的独特的均衡结果。从历史上看，市场环境和市场之间这种有序和系统联系的知识猎场结果就是经典的竞争概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的作者都很难将其设想为“完全的”。为了使竞争过程的概念适应一种相当简单的（瓦尔拉斯主义）力学形式所施加的严格要求，坎蒂隆和斯密等早期作者所呈现的现实主义的竞争行为形象被理想建构系统地取代，逐渐越来越强调完全知识、资源的完全流动性、无限数量的竞争者、价格均匀性、产品同质性等等。

所有这些假设都赋予了竞争“模型”简洁的数学属性，但从表面上看，它与古典竞争概念中固有的竞争过程无关。因此，奥地利学派对新瓦尔拉斯主义竞争的批评是，它把经济分析误导到了不现实和（有些）非生产性的渠道。¹⁶

奥地利学派竞争理论与坎蒂隆理论的相似之处可以通过考察企业家的角色来最好地理解。¹⁷ 对于伊斯雷尔·柯兹纳来说，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没有分离一

¹⁴ 同上，pp. 60–62.

¹⁵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p. 92–106; I. M.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¹⁶ 哈耶克并不否认新瓦尔拉斯主义理论对静态经济分析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坚持认为，它对经济动态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贡献。参见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 95.

¹⁷ 确实，这可能是掌握坎蒂隆竞争理论的唯一方法。在他的《概论》中没有提到“并发”，并且在此基础上，至少一位作者声称坎蒂隆仅以较小的方式推进了竞争学说。见 K. G. Dennis, *‘Competition’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p. 60. 另一方面，坎蒂隆对这位企业家的提及比比皆是。《概论》只有 165 页，但有 110 处单独提及了企业家。

一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家的。¹⁸ 坎蒂隆的观点，虽然没有如此明确说明，但与柯兹纳的观点是兼容的。

坎蒂隆是第一批根据个人的阶级来构想经济的经济作者之一，每个阶级都由一个主要的经济功能定义。他确定的三个阶级是地主、劳动者和企业家。最后一个阶级与其他两个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成员生活在不确定性中。举一个农场主-企业家的例子，坎蒂隆写道：

谁能预见一个国家一年内的出生和死亡人数？谁能预见家庭中可能发生的开支增减？然而，农场主的产品价格自然取决于这些不可预见的情况，因此他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经营他的农场企业。¹⁹

因此，坎蒂隆系统中的市场参与者缺乏完全的预见性，导致了企业家功能的产生。此外，企业家在坎蒂隆的经济体系中和在柯兹纳的经济体系中一样显眼。坎蒂隆认为，“一国之中的所有交换和流通都是以这些企业家为媒介进行的”。²⁰ 因此，如果竞争生来即是市场交换的本质，就像坎蒂隆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必然与企业家精神密不可分。

坎蒂隆的理论有一个非常现代的方面，即它处理的是企业家的功能而不是个性。对坎蒂隆来说，企业家的职责是承担市场活动所固有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冯·米塞斯也遵循了同样的推理路线。然而，冯·米塞斯克服了坎蒂隆对企业家精神的看法中的一个短视的因素。坎蒂隆认为，地主和某些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免于不确定性。他认为，只要房东保留土地所有权，他们就会收到固定的合同租金；劳动者只要有工作就可以获得固定的合同工资；企业家以确定的价格购买，然后以不确定的价格再次出售。

和坎蒂隆一样，冯·米塞斯将企业家视为“专门发现每一行动之不确定性的行动人”。²¹ 但对于冯·米塞斯来说，企业家精神的概念超越了阶级差异。他拒绝让地主和工人免于不确定性，而是声称“任何生产资料（无论是有形财货还是货币）的所有者，都不会免于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冯·米塞斯“民主化”了这个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企业家精神“是每一个行动所固有的，由每一个行动者承担”。²²

虽然冯·米塞斯有效地拓宽了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的视野，但柯兹纳对这一概念的处理再次缩小了视野，尽管是以一种有趣和挑衅的方式。对于柯兹纳来说，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对盈利机会的警觉（alertness），其运作方式包括套利。与冯·米塞斯的企业家-投机者不同，柯兹纳的企业家-套利者不需要任何类型——人力、物质或财务——的资本。他也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来完成他的功

¹⁸ 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p. 14)，柯兹纳坚持说：可以表明，我们对市场学习能力和利用市场信息的持续流动来产生（竞争）市场进程的信心，关键取决于我们对企业家元素良性存在的信念。”

¹⁹ Cantillon, *Essai*, p. 48.

²⁰ 同上，p. 56. 另见，上述，注 16.

²¹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3rd rev.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3), p. 253.

²² 同上。

能。他只需简单地警惕迄今为止未被注意到的机会，以便他“以高价出售他可以以低价购买的东西。”²³

最近，劳伦斯·H. 怀特（Lawrence H. White）认为柯兹纳的理论忽视了时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怀特指责柯兹纳没有充分区分套利家精神

（arbitrageurship）和企业家精神。²⁴ 套利是指当前的、已知的利用价格差异的机会，这些价格差异超过了时间或空间上的交易转移成本。另一方面，不确定性只存在于未来。通过将企业家精神限制在套利活动中，柯兹纳淡化了不确定性在定义企业家角色方面的重要性。结果是柯兹纳的理论是不对称的，侧重于企业家的盈利前景而忽略了他遭受经济损失的机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种观点——现代奥地利主义的“铅垂线”冯·米塞斯的观点和前者的门徒柯兹纳的观点——都在坎蒂隆早期对企业家精神的处理中找到了部分理由。坎蒂隆认为资本对于企业家功能不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并没有将柯兹纳的“纯粹而身无分文的企业家”概念化。事实上，对于坎蒂隆来说，如果缺少其他资本，人力资本的某些要素似乎需要替代其他资本。至少这是可以对坎蒂隆的观察做出的一种解释，即除了固定租金和工资的情况外，

其他所有人都是企业家，无论是他们有资本设立企业，还是他们是靠自己劳动而没有资本的企业家，都可以被视为生活在不确定性中；连乞丐和强盗也属于这个企业家阶级。”²⁵

在其他地方，坎蒂隆列出了企业家活动中的套利行为。坎蒂隆注意到巴黎和乡下之间的价格差异往往会创造利润机会，他说

企业家……将以低价购买村庄的产品，并将它们运送到首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种价格差异必然会支付马匹和车夫的保养费用，以及企业家的利润，否则他将停止营业。²⁶

在外围，坎蒂隆对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的看法似乎与柯兹纳的观点一致。两者都将市场体系视为由消费者、资源所有者和企业家-生产者的互动决策组成。两者都不认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有任何逻辑上的分离；每个人都认为市场过程具有竞争性，因为竞争的企业家通过不断和反复的努力相互超越对方，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有吸引力的买卖机会。两者都将企业家功能的起源追溯到缺乏远见，都将企业家视为市场均衡过程的驱动力。

然而，在根本上，关于企业家角色的性质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坎蒂隆的著作中最一致的企业家形象是一个面临不确定性并承担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人。这要求企业家拥有某些资产或通过信贷安排获得某些资产。似乎没有其他

²³ Kirzner, 同上, p. 39.

²⁴ 参见 Lawrence H. White, “Entrepreneurship, Imagin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Equilibration,” an unpublished paper writt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for Prof. Robert Nozick’s Philosophy 177 Course (January 14, 1976).

²⁵ Cantillon, *Essai*, p. 54.

²⁶ 同上, pp. 150–52.

方法可以让企业家有意义地暴露于风险之中。因此，最终，相比柯兹纳的企业家，坎蒂隆的企业家与冯·米塞斯的企业家更相似。

从米塞斯的概念中产生的现代企业家精神理论，例如柯兹纳和 T.W. 舒尔茨 (T.W. Shultz) 的理论，²⁷ 在坎蒂隆那里找到了比在 J.B. 萨伊 (他一定知道坎蒂隆的工作，至少通过重农主义者间接地知道) 那里或约瑟夫·熊彼特 (他在维也纳大学接受过奥地利传统的培训) 那里更坚实的历史基础。在萨伊的学说中，企业家行为包括几种经济活动：计划、组织、监督、创新和资本供应。没有证据表明坎蒂隆将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项视为天生地是企业家的。对熊彼特而言，企业家采取行动**扰乱**现有的均衡状况，从而破坏经济互动。相比之下，坎蒂隆的企业家通过进行各种调整来促进均衡，以平衡特定的需求量和供应量。

货币对价格和生产的影响

坎蒂隆的分析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最密切的关系是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价格和生产的影响。哈耶克于 1930 年在伦敦大学开始了他的一系列批判性经济讲座，引用了坎蒂隆的一段赞扬语录，其中作者批评洛克处理结果而不是原因和原则。

洛克先生认为与货币数量成正比的商品和产品的数量是市场价格的调节器，他把这作为一条基本格言。……他清楚地看到，货币的丰富使一切变得昂贵，但他没有考虑过它是如何做到的。他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找出货币的增加以何种方式、以何种比例提高了物价。²⁸

坎蒂隆的研究——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它的数量维度——使他相信，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数量论的各种“幼稚”版本经常假设的直接关系。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区分相对价格和价格水平；他正确地推理出，货币变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新货币从哪里进入经济以及它首先到达谁的手中。如果增加的货币落入消费者手中，他们将增加某些财货的支出，从而推高这些财货的价格。由于人们对某些财货的购买可能多于其他财货，“根据获得货币的人的喜好”，²⁹ 相对价格必然会发生变化。

相反，如果增加的货币最初落入储蓄者手中，他们用它来增加可贷资金的供应，那么当前利率将被压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的构成将在有利于投资。³⁰ 哈耶克随后在 1930 年的演讲中发展出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萌芽包含在最后一个概念中。

²⁷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3 (September, 1975), pp. 827–46.

²⁸ Cantillon, *Essai*, p. 160.

²⁹ 同上，pp. 162–66; 172–74. 因此，“在英格兰，肉类价格可能会上涨三倍，而谷物的价格只会上涨四分之一” (*Essai*, p. 178)。

³⁰ Cantillon, *Essai*, p. 214.

鉴于我们这个世纪关于货币和价值理论的“经典二分法”的争论，以及货币中立性的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坎蒂隆拒绝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分开。他坚持可贷资金利息理论，声称“一个国家的货币利息是由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比例决定的，……正如物价在市场的变化中是固定的……”。根据买卖双方的比例。”³¹ 着眼于相对价格，坎蒂隆调查了新货币对利率的影响，并再次得出结论，特定需求方面至关重要。

如果一国的大量货币落入放款人的手中，它无疑会通过增加放款人的数量而使当前的利率大跌：但如果它落入那些花钱的人手中，则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并会通过增加企业家数量来提高利率，这些企业家因为增加的支出而有所可做，并且需要借钱以将企业扩展到每一类客户。³²

实际上，坎蒂隆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许多下个世纪的作家显然没有看到的东西，即大量涌入的贵金属可以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矿山的产出可能会被借出——这往往会降低利率——或者可能会被花掉——这将直接刺激生产，增加预期获利的贷款需求，并提高人们对此类贷款的支付意愿。

除了预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关于货币与相对价格变化的重要关系之外，坎蒂隆的分析补充了奥地利学派理论，即使在后期也是如此。相对价格的概念包括同一财货在不同时刻和不同地点的价格。尽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率先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时间，但他们基本上忽略了空间的影响。坎蒂隆只是略微意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³³但他在寻求将面积和距离的影响纳入他的经济分析方面领先于许多后来的作者。虽然这里不是详细分析坎蒂隆对空间经济学的影响的地方，但我们应注意以下贡献：（1）坎蒂隆在洛克对货币增加对产品价格影响的解释中注入了区位因素；（2）他对空间上的均衡价格差异提供了理论解释；（3）他提出了各种交换和生产活动的位置的经济学解释，并在此过程中预测了空间经济学的一些后续发展。³⁴

结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声称与 18 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有密切关系，但其他经济学家并不总是清楚这种联系在哪里。本文表明，理查德·坎蒂隆在 18 世纪预见了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几个关键要素。然而，坎蒂隆的不幸不仅在于遭遇了一次充满暴力的英年早逝，而且在于在经济学史中被忽视了一百多年。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 1881 年衡量了坎蒂隆的血统和他的命运。

³¹ 同上，p. 198.

³² 同上，p. 214.

³³ 例如，他指出，“通过第一手购买……客户宁愿多花一点钱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小批量买到手，而不是放在库存中”（*Essai*, p. 53）。

³⁴ 有关这些论点的详细说明，请参阅 R. F. Hébert, “Richard Cantillon’s Early Contributions to Spatial Economics,” *Economica* 48 (February, 1981), pp. 71–77.

第一本经济学综论可能是由一位有着西班牙名字的银行家写的，他出生于凯里郡的一个爱尔兰家庭，不知道在哪里长大，在巴黎开展业务，但显然在阿尔伯马尔街【伦敦】被谋杀。³⁵

我们敢在已经混杂在一起的民族中加入奥地利主义的元素吗？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传统最显着的特点可能是其激进的主观主义。门格尔颠覆了（英国）以生产成本来解释价值的百年传统。他通过使价值取决于寻求满足自己需求的个人的主观效用考虑来做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坎蒂隆的分析是完全不同的。他的价值理论以客观或内在价值的经典概念为中心。然而，坎蒂隆关于市场体系运作、竞争和企业家精神以及货币对市场价格影响的观点与过去和现在的奥地利传统相一致。这些观点并没有使坎蒂隆成为奥地利教派血统纯正的成员，但它们使他成为了一位重要的早期同路人。

³⁵ W. S. Jevons, "Richard Cantillon and the Nationality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Review* (1881): 重印于 the Higgs edition of Cantillon's *Essai*, p. 360. 杰文斯可能补充说坎蒂隆还在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维持业务。